

《汤液经法》、《伤寒论》、《辅行诀》古今谈(续完)

钱超尘

【摘要】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马继兴教授主编《敦煌古医籍考释》、甘肃中医学院丛春雨先生主编《敦煌中医药全书》、马继兴教授主编《敦煌医药文献辑校》皆收录《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下简称《辅行诀》)。《辅行诀》以确切的资料证明《伤寒论》是仲景在《汤液经法》一书的基础上勤求博采而撰成。文章对《辅行诀》的作者、发现、抄本寻踪、存佚及校注和论文方面进行了研究,详述马继兴等对《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的鉴定意见,指出《辅行诀》对《伤寒论》文献史考证的重要启示。从王圆箎藏匿经卷待时而售,引出藏经洞的由来和被发现过程以及其中文物被斯坦因、伯希和等骗购劫掠过程。

【关键词】汤液经法; 伤寒论; 辅行诀

【中图分类号】R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 6613(2008)08- 0439- 06

5 王圆箎藏匿经卷待时而售

敦煌藏经洞被劫掠,宝贵经卷大量流入他国,这是中华民族文化无法弥补的损失。清末政治腐败,国势衰微,必然导致如此惨剧。

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率领法国中亚探险队来到敦煌,对莫高窟全部洞窟进行编号,翻遍藏经洞所有文物,伯希和精通汉语,从中选取精而尤精之品,其中包括《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王道士把《辅行诀》秘藏,于1918年卖予张偃南。从《辅行诀》于1908年首次发现至1918年被售出,中间相隔10年。有人问:藏经洞的经卷、文献不是被斯坦因、伯希和全部劫掠了吗,王圆箎怎么至1918年还存有经卷呢?试问,王圆箎有藏匿经卷售卖的事实吗?是他仅藏匿《辅行诀》这一卷经卷,还是藏匿过其他经卷?如果他曾经藏匿并售卖过其他经卷,那么,他卖给张偃南的《辅行诀》一卷就可以得到旁证;如果他从来没有藏匿过其他经卷并把这些经卷售卖给他人,那么,《辅行诀》由王圆箎出售的事情,就值得怀疑。

为了考查王圆箎藏匿藏经洞经卷并待时而售的史实,让我们把此事的考察放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下加以回顾。所谓“更广阔的历史背景”是指从斯坦因于1900年率先到敦煌盗宝至1924年美国华尔纳率团撕揭壁画这段历史。

藏经洞是在一个偶然的时机中被发现的。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敦煌莫高

窟下寺道士王圆箎在清理第16号洞(今编号为17洞)积沙时,发现一洞,内藏大量经卷,其中秘藏公元4~11世纪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文物五万余件。这一震惊世界的发现为研究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技、医学等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珍贵资料,被誉为“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古代学术的海洋”。藏经洞出土的珍贵文献与河南安阳殷墟甲骨文、汉简、明清档案的发现被称为中国近代四大发现。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二册第728~729页说:“莫高窟创建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现存最早洞窟可能是十六国北凉(公元421~439年)时开凿。此后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朝代,均相继兴建。现有洞窟492个,窟内壁画4.5万多平方米,敷采泥塑2400余身……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道士王圆箎在莫高窟发现一个藏经洞(即第17窟),是20世纪最重大的古代文献发现之一。洞中发现藏匿近千年的四万多件古代写本、印本和文物。除大量汉文佛经外,还有儒家、道家以及其他宗教典籍。其他民族文字的写本、绢画和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官私文书等。这些文物大都被英、法、日、俄等国的探险家掠走,残余者现藏北京图书馆。”1988年莫高窟被列入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公布的《世界遗产目录》。

5.1 藏经洞的由来与封存

藏经洞原是僧人洪辩的影身洞,位于敦煌第16号洞内,具体位置在第16号洞甬道北侧的墙壁之中。洞内供奉晚唐河西都僧统洪辩影身像。洪辩生年不详,卒于唐末咸通三年(862)。其弟子为其塑真容像供奉于窟

内,并立告身碑,开凿此洞时间在晚唐。公元十一世纪初,莫高窟僧人将大量佛经、绘画、法器及其他文书秘藏于该洞内,将洞口密封,外饰壁画,后来称为藏经洞。藏经洞封闭的具体时间和封闭的原因,因为缺乏文字记载,尚无明确结论。近百年来,封闭该洞的原因,择其要者,有以下两说:一为废弃说,一为避难说。废弃说认为,新抄佛经或印本佛经的出现,逐渐替换旧日佛经,而佛经是神圣之物,不能随便堆放,应加妥善保护而封存。避难说认为,因避西夏人进攻敦煌或黑汗王朝进攻敦煌而封存。众说纷纭,至今尚无大家认同的结论。陈垣先生在《敦煌劫余录·序》中对封洞时间下限提出如下之说:“《通考》载:大中祥符末,沙州归义军节度使曹贤顺犹表乞金字藏经。景祐至皇祐中,朝贡不绝。知此等经洞之封闭,大约在皇祐以后。”皇祐为北宋仁宗年号,当公元 1049~1054 年。此说在敦煌学研究上有较大影响。

5.2 藏经洞是怎样被发现的

藏经洞是道士王圆箓发现的。王圆箓,湖北麻城人,贫家出身,为谋衣食,游走四方。光绪年间,进入肃州巡防营当兵勇,信奉道教。离开军营后,受戒为道士,道号法真。后流寓莫高窟,居住在下寺三清宫,供奉香火,布道募化。据王圆箓在他所写的《草丹》中说,他于光绪二十六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公元 1900 年 6 月 22 日)在清扫积沙时,发现第 16 号洞甬道北侧墙壁之内有一石窟(现敦煌研究院编号为第 17 号窟),内藏经卷等物。《草丹》是 1944 年在王圆箓用过的一个木柜中发现的,现藏敦煌研究院。《草丹》全文及发现经过,载于原国立西北图书馆编印的《西北文化周刊》第 27 期《记王道士催募经款草丹》一文,作者子青。研究敦煌学,了解王圆箓很重要,《敦煌学概要》一书的作者苏莹辉刊载了《草丹》照片。姜亮夫先生在《莫高窟年表》一书中将《草丹》加上标点发表。“草丹”之“丹”有人认为是“册”的俗写,也有人认为是“单”的同音字。还有人认为“丹”字表示对青天佛祖呈现自己一片丹心赤诚。研究王圆箓的另一个重要材料是 1931 年立的《王园箓墓志》,现嵌于敦煌研究院招待所外之王道士墓塔上。该墓志称王道士曾上书说,发现藏经洞的日期为清光绪二十五年农历五月二十五日(1899 年 7 月 2 日)。学术界现在皆采用 1900 年 6 月 22 日之说。王圆箓没有文化,没有认识到这批经卷的宝贵价值,于是把它们取出来交接官府要人,这样就为藏经洞文献外流打开一条缺口。王圆箓是藏经洞的发现者,也曾私藏许多经卷待机出售,这些都是有据可考的。《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为王圆箓所藏后售予张偓南,考之王园箓一生主要作为,售予张偓南之事,不容有一点怀疑。光绪三十年(公元 1904 年)肃州布政司命敦煌县令汪宗翰就地“检点经卷画像”,对藏经洞文物再次封存,不得外流。

5.3 藏经洞文物被骗购劫掠

王圆箓发现藏经洞大量经卷,取出部分经卷佛经画像等分送州县官员与乡绅势要,这些宝贵文献开始流向社会,逐渐为人所知,亦为英国探险家斯坦因所知。

5.3.1 斯坦因骗购劫掠 1907 年斯坦因来到新疆、甘肃以后,地方官吏在资金、交通、向导等诸多方面,给予积极帮助。1909 年 3 月 8 日,斯坦因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作了一个题为《中亚细亚探险谈》的报告,这篇报告的前半部分,详细叙述了他在莫高窟盗宝的经过。虽然有许多文饰之词,但仍然反映出他使用的卑劣伎俩。作完报告以后,前驻中国新疆喀什噶尔的领事麦坚尼站起来发言,回顾了斯坦因在中国受到的各种关照,从中反映出当时清廷政府及地方官吏的腐朽与昏愤。让我们把麦坚尼的话引在下面:“斯坦因博士披读前文毕,前喀什噶尔领事麦坚尼君起而言曰:

余闻斯坦因博士谈中国官吏之优遇,心特乐之。余幸居新疆数年,博士所遇官吏,半余之故友也。其旅行之成功,亦半由中国官吏之助。盖测量及发掘二事,在在需地方官吏照料。更举一事,足徵中国官场厚意。新疆全土,固无银行,道途之费,悉用生银。取携既艰,危险尤甚。博士此行,虽以喀什噶尔为东道主,然东行千五百余英里,时阅二年,故旅费一事,实博士至艰极大之问题也。幸喀什噶尔道与阿克苏道许札各州县,随处贷银。而余于喀什噶尔偿之。故博士得于和阗克勒底雅、喀喇沙尔地方官署,随时取给。此事在他国固无异,但新疆各处,交通极艰,道府各库,向罕通融,兑汇之举为难,可见厚意,尤可感也。”^[17-18]

下面是斯坦因的报告,摘引如下。

中亚细亚探险谈 斯坦因

予于今日之会,拟与诸君略述在中国塞下之事。所历之时,如在昨日;所阅之境,迥出意表。岁月不居,若前日事。姑举一二,足知其概。

余数骑东行,绵历岁月,某日之晡,始抵长城之下。是时心中,若有所感。因念此处人文之停顿,地力之枯竭,草草二千年,若旦暮耳。平生今昔之思,无逾是矣。日既西倾,直视无极,群堠相望,迤邐十余英里。与斜日相射,作金黄色。诸堠之间,络以边墙,如褐色直线,蜿蜒于灰色砂碛中,颇疑墙堠之中,有人拒守。下瞰北方高原废川,若存若亡。余行其下,时得箭镞,青铜所制,锈涩无多。偶见盐泽之旁,多生灌木,又疑匈奴游骑,出没其间,以俟夜袭者。又见一绿如畦,与边墙平行,其广二十英尺,就而察之,始知千百年间,行人戍卒,履屐交错,印于沙泥。其迹虽浅,其文颇明。边城之下,环以是线,距今骆驼通路,尚数英里。何以验之,知为履迹?余初

至敦煌,偶行沙上,时阅二月,日有大风,再过其地,履迹如新。非经目验,不能信也。

塞下之地,土壤气候,各有特性,以保存古迹。更举一例,可以知之。斥堠之下,小垆甚多,形类十字,质似一石,各占七平方英尺,高六英尺。此种小垆,问是何物,乃束芦为积,纵横叠之,粗沙细石,交错其间。芦苇之中,本含盐质,积久蒸变,乃类僵石。然试于其中,摘取少许,剖而视之,条理尚存。此乃古代所积,以缮城垣。今日车站之傍,枕木如山,亦犹是也。

缅此遗迹,出于秦馀,绵延至今,二十馀世纪。凡地理之变态,悉历史之尺度。且此种变化,全由天演,不杂人为,耳目所睹,足为铁案。惜于此际,不能备述也。

沙漠之地,日有暴风,气候寒暑,恒逾常律。四月以前,冰风塞途,毡裘数重,无异絺绤。千九百七年四月一日,最小温度,在冰点下三十九度。及是月之杪,背日之处,温度犹至冰点上九十度。大风所至,蚊蚋云集。余之行帐,因逐水草,颇近盐泽,百虫所萃,人畜俱困。余尝七日之间,蛰居帐中,以避啮噬。虽顽如野驼,亦畏其毒。入夏之后,远水而居,水味甘咸,不适于饮。故于五月中旬,掘地既毕,遄返草地。地势则如此,气候则如彼,而所雇发掘之土人,性本懒惰,又嗜鸦片。然掘地之业,卒告成功,则翻译蒋君之功为多。

余因阅览古迹,故遂至敦煌。当千八百七十九年,余友匈牙利地理学会会长洛克济教授曾随伯爵斯希尼之远征队至敦煌东南之千佛洞。千九百零二年,曾以语余,并谓洞中画壁雕刻之美,冠绝东方。余深感其语,故有敦煌之行。

余以千九百七年三月,始至敦煌,即访千佛洞。其洞在荒谷之口,危岩之上,在敦煌东南十二英里。余至其下,始叹洛氏之言不诬。窟穴大小,殆以百数。高下成列,颇不整齐。石色纯黑,上施雕凿。洞之大半,皆有壁画,美丽殊伦,完缺不一。绘画之法,源自身毒。余于和阗沙漠所掘废寺,佛画规模气韵,大略相同。造象之多,与壁画等。可证古代支那印度,美术交通,惜多为后人补葺,失其真矣!

岩洞之傍,颇多碑碣,证此古寺,建于唐代。当时佛教,盛于支那,又二百年间,西陲无事。北免突厥之兵,南靡吐蕃之寇。自是以降,迄于蒙古之兴,则外常为蛮族之所蹂躏,寺宇之丽,僧尼之数,为之太减矣。顾情势虽变,而宗教未革。余周览各洞,多见巨象,其最高者,近百英尺。此种制作,稍属后代。读马哥波罗旅行记《沙州》一篇,可见元时唐古特人民拜偶像之奇俗矣。

敦煌之民,虽至今日,犹皈佛教。余等去敦煌之日,正敦人瞻礼之期。市民村民,来谒千佛洞者,数以千计。可知寺宇虽残,犹为礼拜之地。故余于此地,就画壁造象,深加敬护。除照影绘图外,不敢有所希冀,恐伤人民

之情也。

余于五月二十日,复至敦煌,拟为小住之计。盖二月以前,已略闻道士于二年前修理寺宇,发现古代写本之事。此种宝物,置于古室,守卫颇固。余为求书计,不能不徐图之也。

道士为人,颇奇妙可喜。彼不知所保守者何物,又对神与人皆有戒心。余初与之交涉,甚为棘手,事之颠末,兹不必言。但其成功,除翻译蒋师爷(按“蒋师爷”三字下有注:“编者按,名孝琬”)之秘策外,余之支那大护法圣人玄奘法师,实为余牙人焉。余此行颇类玄奘,又甚敬玄奘,人颇知之。道士虽不知佛教事,然其敬之也与余同,特其所以敬之之道异尔。虽荒唐之《西游记》视玄奘为神人者,其说不见于《大唐西域记》,然此与余事何关系乎?当道士以石室者一本示余也,乃汉文佛经一卷。首署大唐三藏法师玄奘译。道士与蒋君皆惊其异。蒋君遂言,此室之开,得非玄奘之灵,留以俟其自印度来之弟子乎?道士然之。

道士既闻此说,始敢启大门招余入。余等入门,经前广道,遂入石室。室外故有画壁,壁裂而室见。室中暗甚。余从道士油灯光中,见卷帙成堆,自地上起,高约十英尺。后精计之,其容积殆近五百立方英尺。顾在室中,不能阅览一物。道士乃手持数卷,导余至廊下之屋,使予疾览之。余下帷审阅,以免人探问,不觉惊喜之交集也。

所有卷轴,大抵汉文写经,高约一尺,卷束甚厚,虽完好如故,然观其纸墨形制,古可知也。每展一卷,恒在十英码左右。故求其所记时代,甚为烦难。后于汉文大经卷背面,发现印度婆罗谜草书 Indian Brahmi Script,积疑始释。足证写经之时,中亚细亚佛教徒中尚知梵文,此为稍古之事矣。一切写本,依然初藏时之形状,且无几微湿气。盖保藏古物,固未有愈于沙漠中之石室者也。

余于开一大包裹时,尤惊此地保藏之善。其包裹以粗棉布为之,中藏种种绢画、纸画、幡盖、锦缯、刺绣之供献物,不可胜计。其画绢、画布,盖寺中之旌旗,卷藏甚谨;及展示之,皆为诸佛菩萨象。或纯用印度画法,或以印度画为本,而参以中国画。佛象之下,画礼拜者,其服犹昔时桑门之服也。后蒋君发现供献簿,果证为第九、第十两世纪之物。作画之绢,薄而透明,精细无匹,故其大至五六英尺者,摺久痕深,开视颇险,当时亦无余晷细加研究。余之所注意者,惟在利用何策,可使古画脱此危地,而免守者之伤害。后睹道士观此唐代遗物若不足贵,心乃大慰,又不敢再加审谛,恐其以余为酷嗜之也。

此殆由道士不重绘画,或故以此为饵,使余之耳目,不能专注于汉文整卷,故特于其所谓废物之中,多出杂束以示余,然余实深谢道士之殷勤也。余于第一包裹内,已发现中国吐蕃文中有印度草书,叶甚多,所谓

中亚细亚婆罗谜文也。此种书叶,由其形制观之,均属于六种不同写本,或甚繁多,亦有完全者。以余所见,此体梵文,及突厥斯丹宗教文字,其完全及精好未有能及之者。故余与蒋君终日于汉文、藏文、汉梵对译文束中,拾取此种残叶。道士虽以取携为劳,然甚轻视此,故心颇慰矣!

后数日间,所为之事,与所见之物,不暇殚述。有一大束,充以杂书画布,及种种纸页。其最可贵者,为贝叶梵文大书。此明为北印度佛教律藏中之物。书之材料,示其来自印度。且世界所有梵文写本,未有古于是者。吐蕃文书,有卷子本,有扑叙斯 Pothis 本,书亦甚多,且除南方书籍外,尚有他书。盖突厥斯丹东部之回鹘国,至第十七世纪尚存,其时佛教盛行国中,一时或曾据敦煌之地,故回鹘文写本,多至数大束。又摩尼教经之以突厥文 Kok-turki 及叙利亚文 Syriac 书者,亦见于此云。

汉文残纸片,骤视之,若稍不足珍,然实有古物学上之价值。其中杂记如书札、寺历等,充塞于道士所谓废纸中。此不独足以知第九第十两世纪中此间寺院之制度,由其所载年月,亦足证石室之闭,在耶稣纪元千年以后也。其封闭之故,实惧兵祸。然先是,此室必为寺中储藏故物之所。故当封闭之时,其物固已古矣。余一年以后,复检所得汉文书卷,其所纪年月,有在纪元第三世纪者。然定其最古写本写于何时,尚须假以岁月之研究也。

余以多日之劳,速检室顶之丛残卷束,而选写本图画及他古物之特异者,乃开汉文写本卷轴之大匮。虽道士之心已为贿赂所易,然颇有难色。又清理全室之事,虽胆壮者犹为寒心,况以彼之怯懦乎?然清理之末,果于室下得画绢若干束,又于汉文卷中,得中亚细亚婆罗谜文及他文写本等。此处寺宇,本道士所重修,故寺中所有各物,悉为彼有。而交易之道,则余以自由捐助之名义,施诸寺宇;所取诸物,亦以假归细阅之美名,携至余处,初无一人知者。

购取之事,多出蒋君之力,至其不为人所指目,则又有说,兹不暇述。当道士既得马蹄银后,暂至敦煌,验其名望,不减于昔,心乃大慰。且以余之购此,将以佛教之文学、美术播于西方,又使古物,不受后此灭亡之厄,甚盛业也。余四月以后,复至兹寺,道士对余无异词,余心尤慰。迄于今日,二十四箱之写本,与五箱之图画、绣品他物等,安抵伦敦,此乃余最终之慰藉也。

余于六月中旬,始毕千佛洞壁画造象之摄影,古物之研究告终,乃从事于地理上之探险。此次事业,自南山始,余以书籍寄于安西州署,乃南向雪山脉。^{[5]-6}

以上是斯坦因《中亚细亚探险谈》一文的前半部分,后半部分是记述他在甘肃新疆进行山川沙漠考察的内容,与本文无关。仅从上述记述中,我们已可以看

出,斯坦因这次强盗性的劫掠,给中华民族异常宝贵的文化遗产,造成何等严重的损失!斯坦因从藏经洞盗掠之宝物,现藏英国伦敦博物馆、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伦敦英国图书馆、伦敦维多利亚博物馆、印度新德里国立博物馆。他在《中亚细亚探险谈》的结尾说:“古物百箱,安然无恙,喜可知也。”英国赫亨博士没有听到斯坦因报告,后来看到他的报告文稿,于是写了一信给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予虽不能躬听斯坦因博士之讲演,然读其文,而大乐之,不能不略书数语,以致余之钦佩……今日、英、德、法、俄、美诸国远征队往东方者,踵趾相接,然未尝有竞争之事。盖沙漠至广,尽有探险之余也。余深信古代之文化,尚多埋于流沙之下也。今日斯坦因、额龙威特、尔莱哥克等所携归者,足使欧洲各国之学问家,竭数年之力研究之而不足。”

斯坦因劫掠之敦煌文献,经整理编号,共近七千种,皆用 Stein 之名编号,其编号从 S0001 至 S6980,则斯坦因盗窃之敦煌文献,为 6 980 种。斯坦因(1862 年 11 月 26 日~1943 年 10 月 26 日)原籍匈牙利人,后加入英国国籍。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七册第 457 页介绍,斯坦因“1888~1889 在印度旁遮普省任拉合尔(现属巴基斯坦)东方学院院长。1892 年刊印梵文版《五河》,该书是唯一流传下来的印度历史著作,著者是公元十二世纪的迦尔诃那。斯坦因的英译本题名《斡什米尔诸王编年史》,于 1900 年出版。同年开始其首次中亚之行,经过中国西部地和阾,取道古代中西商队来往路线,收集文献资料及手工品甚多。在敦煌附近发现千佛洞,所藏绘画、寺庙旗幡和文物极富,都是十一世纪时封存的文物。考察结果写成《古代和阾》(2 卷,1907 年)、《塞林迪亚》(5 卷,1921 年)和《亚洲腹地》(4 卷,1928 年)。”

据《敦煌——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说,斯坦因曾先后三次深入中亚以“探险”的名义盗取我国宝贵文献。第一次(1900~1901 年)主要发掘和阾地区、尼雅的古代遗址。第二次(1906~1908 年)除重访和阾和尼雅遗址外,还发掘古楼兰,并深入和西走廊。于 1907 年到敦煌拍摄石窟壁画,利用王圆箎的愚昧无知,“廉价骗购藏经洞敦煌写本二十四箱,绢画和丝织品五箱,其旅行记《沙漠契丹废墟记》中有敦煌骗宝的详细记录。第三次探险(1913~1915 年)时,重访莫高窟,又从王道士手中获得 570 余件敦煌写本。斯坦因三次中亚探险所获敦煌等地出土文物和文献,总数约二万余件^{[6]181}。这里需要我们注意的是,斯坦因第三次到藏经洞的时间(1913~1915 年)距 1907 年在莫高窟盗宝年相隔六七年,王圆箎手中竟然还有这么多经卷写本,可以证明王圆箎藏匿的经卷数量是相当可观的,因此也可以印证,1918 年他卖给张偃南的《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是王圆

策所藏匿经卷的一种,他是为卖钱而藏匿,不是为保护而珍藏。观其所为,实为盗卖。

5.3.2 伯希和骗购劫掠 与斯坦因敦煌盗宝相隔无几,法国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率领法国中亚探险队又至莫高窟盗掠。《辞海》介绍伯希和说:“伯希和,法国汉学家。曾任职于法国远东学院(河内)。1906~1908年活动于中国甘肃新疆一带,盗窃敦煌千佛洞大量珍贵文物,运往巴黎。1911年起任法兰西学院(巴黎)教授。1925年主编东方学杂志《通报》,著有《敦煌千佛洞》等。”《敦煌——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介绍的较为详细:“继斯坦因后尘接踵而来的是法国人伯希和。伯希和早年在法国政治科学院、东方语言学院等处学习,后往越南河内学习并任职于印度支那考古学调查会即法国远东学院,曾多次到中国,是一位汉学家。1904年回法国,任法国中亚探险队队长,于1908年来到敦煌莫高窟。”也正因为伯希和是汉学家,所以他盗掠的敦煌文献皆为精品中之尤精者。《敦煌学目录初探》对伯希和所盗珍宝做了如下分析:“伯希和曾从学于法国著名东方学家。汉学水平较高,对东亚考古的知识相当丰富。在来华盗宝者中,他在知识学业方面的准备是相当充分的。他又是唯一的在堆满藏品的藏经洞中认真查阅挑选的盗劫者,因而他的收获特别大。他所盗劫的敦煌遗书,从总体上讲,是现在中、英、法、苏、日五大收藏国中质量最好的,藏品中有较多的经史子集四部卷子和古藏文卷子,标明年代的写本多于其他几处藏本。伯希和劫卷中的汉文文书部分品种特别全,几乎囊括了藏经洞中所出各种品种。劫卷中有年代的汉文文书特别多。在文书学研究中供作断代研究作上下限指标的材料特别多,这一点英藏也比不上”^[7]。伯希和选中《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说明他对此书的价值有深刻认识。

伯希和于1908年至莫高窟,对全部洞窟进行编号,并抄录题记,拍摄大量图片。伯希和精汉语,将藏经洞遗物全部翻阅一遍,廉价骗购劫掠大量文献。伯希和盗窃之敦煌文物约2500种(不包括藏文)其编号前均冠以Pelliot,简称P,如P3287。伯希和著有《敦煌石室访书记》,题为“法国安南远东学院教授委任中亚探险事宜伯希和著”,吴江县陆翻译。1908年3月26伯希和给他的上司西奈写了一封信,详细叙述了他在莫高窟窃取文物的情况,这封信于1908年发表于《法国远东学院学报》第八卷第314号,文章题目为《甘肃再发现的一个中世纪书库》,这是欧洲最早报道敦煌文物遭到西方人劫掠的文章。

1909年秋,伯希和携带部分敦煌写本,经南京、天津至北京,出示给北京学者罗振玉、蒋斧、王仁俊、董康等人观看,看后“惊喜欲狂,如在梦寐”,并得知藏经洞

尚有部分劫余文献,便以清学部名义致电陕甘总督,电文如下:“学部致陕甘总督电:行陕甘总督,请飭查检齐千佛洞书籍,解部,并造佛古碑,勿令外人购买。宣统元年乙酉八月二十二日。”(见学部官报第104期)。1910年劫余文献全部运京。可恨的是,在文物起运前,王圆箎又转移了大量文书。尤为令人扼腕痛惜者,在运解途中,这些经卷,又被各地官吏窃取许多。待运至北京,又遭李盛铎、刘廷琛等权豪势要窃取,经卷中精好者悉数被偷盗窃取,为掩盖劣迹,竟撕裂文书,以充其数。移交京师图书馆者仅十八箱,经整理编号,计有8697号^{[6][183]}。

5.3.3 日本大谷探险队的骗购 大谷探险队是日本佛教净土真宗西本愿寺第二十二代宗主大谷光瑞(1876~1948年)组织的考古队,曾三次在我国西北地区进行考察探险。1912年探险队成员桔瑞超、吉川小一郎至敦煌,在莫高窟滞留八周。其时,藏经洞文献已被淘空,于是他们对敦煌莫高窟石窟进行大量拍照,在第428窟、444窟进行刻画、署上他们的姓名。他们找到王圆箎,从这位道士手中骗购到四百余件经卷,这些文献现藏日本龙谷大学和大谷大学等处。这件事再一次证明,王圆箎确实藏匿了许多经卷,待机而售。

5.3.4 俄国人奥登堡的骗购活动 1914年奥登堡(1863~1934年)率领俄国东突厥斯坦考察队进入莫高窟,考察队绘制了443个洞窟的图纸,拍摄了两千余张照片,详细绘制了莫高窟立体与平面图,挖掘部分洞窟堆积物,获得大量写本、壁画残片、绢画、麻布画、纸画以及丝织品,又从当地居民手中廉价骗购到三百余件敦煌经卷和文献。无疑,这些文献与经卷也是通过王圆箎手中外流的。

从中我们清楚看到,王圆箎藏匿出售的经卷已超过千件。斯坦因第三次到藏经洞时,从王圆箎手里骗购到570件经卷;1910年敦煌盗余文献解部前,王圆箎又转移大量经卷,其数不详;日本人又从这位王道士手中骗购到400余件;俄国人又从当地居民手中得到300余件,有数字可考者已在1200件以上,文书经卷解运北京前王圆箎转移藏匿多少经卷文书,卖到何方,已经难于考清了!

5.3.5 美国华尔纳的卑劣野蛮破坏 华尔纳(1188~1955年)1924年率领美国哈佛大学考古调查团来到敦煌,此时,藏经洞已经空无一物,于是华尔纳等以野蛮卑劣手段对莫高窟335、321、329、323、320等石窟的壁画,用涂以黏着剂的胶布敷于画面上进行撕裂剥离,同时把328窟的精美菩萨像一同掠至美国。由于剥离技术的失败,使完整的画面散碎,运回美国的残片又有丢失,精美的壁画已经面目全非。1925年华尔纳再次来到敦煌,打算大规模剥离壁画,由于当地居民的反对和官府的阻止,阴谋未能得逞。

细细思索这段历史, 有两个中国人的面孔挥之不去, 一个是蒋师爷, 一个是王圆箎。他们的样子在《敦煌——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书末有照片。蒋师爷名孝琬(? ~1922), 他是带领斯坦因盗宝的向导、出谋划策者, 斯坦因盛赞蒋师爷道: “购书之事, 多出蒋君之力。至其不为人所指目, 则又有说, 兹不暇述。”也就是说, 如果把蒋孝琬所作所为都说出来, 必定成为千夫所指败类。他协同斯坦因盗宝时, 对斯坦因所盗经卷做了分类目录, 约占盗窃经卷的三分之一, 该目录成为当时大英博物馆所藏敦煌经卷的唯一目录。蒋师爷扮演了文化汉奸的可耻角色。王圆箎是个无知的愚民, 他不知道藏经洞的价值, 只想通过这些经卷卖钱, 与甘心充当文化汉奸的蒋孝琬还不是同一类人物。

回顾这段惨痛历史, 令人无限痛心!

我们把《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放在这段历史背景中考察, 可以清楚地看到:

王圆箎藏匿 1 000 余件经卷和文献, 均加出售。《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是他藏匿的经卷之一, 绝不能因为王圆箎于 1918 年出售给张偃南而怀疑《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为藏经洞之物的历史事实。

现在通行的说法是, 王圆箎为伯希和装箱时暗藏了《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似乎是一个偶然的机遇他才把这份经卷藏匿下来。但是把他多次藏匿与转移经卷(如解运文献进京前他又转移选藏文献若干)待机售卖的行为联系起来观察, 这份经卷也有可能是在装箱以前就被他藏匿起来了。

马继兴教授主编的《敦煌医药文献辑校·采访张大

昌先生原卷子发现经过及其特征的录音要点》说: “据张先生回忆, 此书是写在绫子上的, 即丝织品。”^[1]准确的说法应该说是写在“绢”上的。藏经洞的写本许多都是写在绢上的。老百姓对丝织品之“绢”、“绫”细微不同不加区分, 只是依照口语习惯叫做“绫子”。

6 结 论

《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为藏经洞所藏, 绝无疑义。

对照王圆箎多次售卖藏经洞经卷, 则王圆箎将此绢本卖给张偃南之事, 绝无疑义。

张偃南传予嫡孙张大昌之绢子写本《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原卷虽毁, 但其弟子传抄本尚保留敦煌抄本基本内容, 在原卷不存情况下, 尤为可贵。

参考文献

- [5] 王国维. 王国维遗书·第十四册·观堂译稿·上[M]. 上海: 上海古籍书店, 1983.
- [6] 张文彬. 敦煌——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M]. 北京: 朝华出版社, 2000.
- [7] 白化文. 敦煌学目录初探[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9: 101-102.
- [8] 马继兴, 王淑民, 陶广正, 等. 敦煌医药文献辑校[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 205.

(续完)

作者简介: 钱超尘, 男,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研究方向: 医史文献研究

(收稿日期: 2008-05-25)

· 信息 ·

《世界中西医结合杂志》2009 年征订启事

《世界中西医结合杂志》(CN 11-5511/R, ISSN 1673-6613) 是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创刊, 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管, 中华中医药学会主办的国家一级期刊, 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人。由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医学家、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吴孟超任名誉主编, 著名中医学家、中国中医科学院资深研究员路志正教授任主编。辟有专家论谈、名医经验、医史文献、实验研究、药物研究、临床研究、思路与方法、综述等栏目。

本刊属医学类科技期刊, 以国内外中医药、中西医结合临床、科研、教学人员为读者对象。主要报道中医及中西医结合在临床、科研等方面的经验和成果, 探讨中西医结合的思路和方法, 介绍相关领域的国内外进展, 开展学术讨论。现已被《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统计源》期刊、《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国期刊网》、《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收录。

本刊为月刊, 2006 年 7 月创刊, A4 开本, 从 2009 年开始每期增至 80 页, 每月末 28 日出版。每期定价 9 元, 全年 108 元。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国内邮发代号 80-538; 国外向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订阅, 代号 M7968。漏订者可直接汇款到编辑部邮购。

欢迎订阅, 更欢迎您对本刊提出宝贵意见!

联系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东路 115 号院 6 号楼 109 室 《世界中西医结合杂志》编辑部 邮编: 100101

电话: 010-64822253, 64822337

传真: 010-64822253

网址: <http://www.wjtcw.com>

E-mail: sjzyjh@126.com